

八位革命女前辈的故事

第六册

陈琼英的故事

● 杨保申 张慧英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全书共八册



《八位革命女前辈的故事》之六

陈 琮 英 的 故 事

杨保申 张慧英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主 编 辛崇贤 岫 涓

副主编 刘芳莲 李顺义

目 录

苦妹子·····	1
努力学文化·····	5
革命夫妻·····	7
在东方大学学习 ·····	13
营救丈夫 ·····	17
特殊的画像馆 ·····	26
被捕入狱 ·····	31
从事机要工作 ·····	38
长征途中 ·····	43
舍家为国 ·····	50
再赴苏联 ·····	54
母女团圆 ·····	62
转战陕北 ·····	67
不尽的思念 ·····	76
革命老人 ·····	87

苦 妹 子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中，人们常常会想起一位身材娇小而意志坚强的出色女性，那就是任弼时的忠实伴侣陈琮英。

1903年1月，一个弱小的婴儿出生了，她就是陈琮英。可怜的孩子出生刚10个月，母亲便去世了。父亲陈芝轩以教书为生，常年在外忙碌，无法照顾失去母爱的女儿，陈琮英只得由兄嫂拉扯着长大。

生活的艰辛使她备尝人间的辛酸，小小的年纪便经受了磨难。12岁那年，这个苦妹子就进了长沙北门外的西园袜厂当童工。这是一家手工业工场，雇有10多个织工和染工，陈琮英平时住在袜厂里，长年累月艰难地做工。

这时，陈琮英已与任弼时定了亲。这桩姻缘可以说是“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琮英却不是一般的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叫任振声，任振声的原配夫人陈氏温和善良，夫妇俩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便去世了。任振声痛惜不已，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琮英便来到任家当童养

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醇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陈琮英来任家后，婆母对她很好，妹妹们对她很尊重，这使幼年丧母的陈琮英倍感家庭的温暖。尤其使她感到欣慰的是未婚夫温和诚实，酷爱学习。每逢放学回家，任弼时总要帮母亲干活，到地里锄草，或者提水、劈柴、做饭、养蚕。晚上则伏案看书写字。每当陈琮英听到老师和邻里夸奖任弼时的时候，她都非常高兴，仿佛在夸她一样。她希望自己的丈夫将来能够有出息，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此她喜欢他，关心他，为他而高兴，为他而忧思，把自己的命运与任弼时的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较大、设备齐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从此，任弼时在长沙学习了5年。在这5年的苦读生涯中，陈琮英可以说为任弼时解决了不少的困难和忧愁，使任弼时能够专心致志地求学。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袜厂看望陈琮英，陈琮英总是尽力给任弼时弄一点好吃的饭菜。

这期间，中国处于大动荡的年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皇帝，但是新生的民主共和势力和未死的封建势力，还在竭力地对撞和交战中，袁世凯窃国称帝，张勋复辟，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瓜分中国，南北军阀混战……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老百姓的日子更加艰难，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于

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线，合 1000 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 1000 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家中经济上的这种窘迫，陈琮英全都看在眼里，她决心帮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的哥哥在铁路上工作，家境略好一些，陈琮英在工厂里省吃俭用，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精打细算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患难之中，他们更加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任弼时对陈琮英充满无限的感激之情，同时也感到十分惭愧。一个堂堂男子汉，不但不能给未婚妻买几件漂亮衣服，反而要未婚妻用做工的钱来供自己上学，让人心有不安。他只能把对未婚妻的感激之情牢牢默藏在心坎里，待到将来加倍地回报。他把对未婚妻的感激之情化作学习的动力，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5 年的学习生活，使任弼时眼界大开，志向也远大了。他不仅用心学习，而且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后来，任弼时决定赴俄勤工俭学时，陈琮英特别理解和支持。她相信任弼时的选择是对的，她告诉他她会尽心伺候父母亲，会尽心照顾好妹妹们的。此时此刻，任弼时心潮起伏，他信任这位心地善良的姑娘，他为能有这样的未婚妻而感到高兴！

努力学文化

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几年中，思想上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运动中去。

五四运动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反对传统的封建观念，进一步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又走出国门去寻求救国的真理。蔡元培、吴玉章等有识之士，组织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出洋留学，任弼时所在的中学就有 28 人报名参加，李立三、李富春等是留法的积极分子。这个浪潮，强烈地冲击着任弼时，他多么羡慕这些同学们。这时任弼时才 15 岁，中学还没有毕业，家庭经济拮据，三个妹妹都还小，全家的生活担子都落在年已半百的父亲肩上，他思来想去，为寻找中学毕业后的出路而绞尽脑汁。最后，他决定赴俄勤工俭学。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又可以走向社会，为报效国家寻找道路。

任弼时把赴俄留学的消息告诉父母亲时，父亲心情十分

矛盾。他知道儿子的选择自有道理，但又担心异国他乡，人地生疏，道路遥远，途中有诸多艰险。任弼时理解父亲的心情，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但一代青年更应该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奋斗。临行前，他饱含深情地写了封信，劝慰父母，表达自己的心愿。

信的末尾，任弼时请父亲设法帮助陈琮英读书。这件事，他也给陈琮英的哥哥写了信。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仅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祖国，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琮英。但陈琮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一次、两次，陈琮英感觉这样长期下去不是办法，更不愿意把恋人的心思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这个文化人，她打定了主意要学习文化，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琮英疲惫、消瘦，但她却感到精神充实，意志也磨练得坚强了。她知道，如果任弼时知道她在学文化，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对于陈琮英这样的年龄来说，学文化也并不比摇织袜机来得轻松。一切从零开始，上、下、大、小、天、地、人，这样普通而简单的字，对她来说都是生疏的，都得一笔一划去辨认，一个一个地记住。难呵！她看到过父亲读书，看到过哥哥读书，

也见过未婚夫读书，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要从头学起，读书识字，要当一个文化人。她原以为自己一辈子做一个好媳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妈妈就知足了。

谁能料到，是任弼时倾诉衷肠的信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立志学文化。如今她经过自己的勤奋苦学，终于可以看书识字，可以自己读信了。为此她把任弼时从前寄来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少女的心思化作了任弼时的强烈思念。她从任弼时的来信中知道了他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知道了任弼时对她的无限思念之情，知道了任弼时感谢她对父母的悉心照料之情。

陈琮英读着任弼时的来信，仿佛任弼时就在身边似的，少女的心里涌动着股股热流。他并没有忘记她，他在思念着她，想到这，陈琮英俊美的脸庞光彩照人，明亮的眼睛洋溢着幸福之光，少女的心啊，陶醉在美好的憧憬之中。

整整4年，靠飞鸿传书，陈琮英和任弼时度过了1000多个相互思念的日日夜夜！

革 命 夫 妻

1924年8月，任弼时结束了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回到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上海，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工作的忙碌，使他和陈琼英仍然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无暇相见。党组织派任弼时到上海大学任教，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同时，党组织还决定让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他用无产者的理论和科学知识去点燃青年人的革命烈火，一化十、十化百地为革命播种，唤起民众，反抗军阀，反对帝国主义。

1925年1月，任弼时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不久，又担任共青团总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弼时曾经是第一批加入组织的团员，身为团中央领导人的任弼时，积极主张在工人运动中，根据工人的切身要求发动斗争，壮大团的组织。

1925年2月，纱布的行市上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在强烈的斗争压力下，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一些条件，但迟迟没有兑现。这年5月，纱布的行市低落了，资本家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5月15日，日商内外棉第七厂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一批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和日本资本家说理，恢复劳动。资方竟然下令厂警开枪，顾正红当场倒在血泊中身亡，并打伤工人10余名，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愤怒，纷纷起来罢工。还成立罢工后援会，举行公祭顾正红的群众大会。团中央发动学生上街宣传，散传单、讲演、募捐援助失业的工人。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总工会的联合发动下，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运动，号召收回租界，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百余名学生被英警逮捕，拘入南京路老闸捕房。当天下午，上海各界群众近万人集中在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警开枪打死10余人，伤多人，捕去53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团中央书记任弼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各地学生总罢课，号召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广州等城市的青年，响应中共中央和总工会的口号，参加罢工、罢课和罢市，共同的要求是：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

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任弼时主持下的团中央发动青年学生和工人积极站在斗争的前列，全国

55 万参加罢工罢课的群众中，青年学生和工人约占一半。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险恶。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 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的工作。任弼时也希望尽快让陈琮英来到自己的身边，因为从他到上海之后，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而任弼时也是姑娘们追逐的目标。在任弼时的心里，做他妻子的人，只有陈琮英，非她莫娶。

任弼时原来打算回乡看望母亲，并接陈琮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开会去了。他委托另外一位同志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几经辗转，陈琮英终于和任弼时见面了，他们互相对视着，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 1926 年春了。自从 1920 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开始，他们一别已近 6 年。任弼时从一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而陈琮英也从一个袜厂的小童工，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陈琮英告诉任弼时，分手后她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任弼时颇为高兴。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琮英的是神秘和陌生。变幻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立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天，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

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非常不自在。任弼时知道陈琮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沉而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1926年4月，陈琮英和任弼时在上海结婚。这颗在艰苦环境里播下来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织了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婚后，组织决定，让陈琮英担任交通员。

初到上海的陈琮英，一口湖南腔，一身乡下打扮。而任弼时呢，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不断改换装束，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在旧上海一些人眼里，夫妻俩不免有点不大相配。任弼时对陈琮英说：“你初到上海，环境不太熟悉，慢慢会习惯的。你的工作很重要，党中央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罗迈都在上海。我出去活动不太方便，你这身打扮敌人不注意，正便于工作。”

这以后，任弼时常把起草的文件和书信交给陈琮英，按指定地点送给中央的领导人，或是交给秘密印刷厂排印。出门时，任弼时总要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

往家里跑，要想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次，任弼时的大妹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里，陈琮英很想马上去看她。任弼时说：“要找个机会。”过了些日子，组织上安排任弼时搬出亭子间，迁到别处的一间楼房去住。在搬家的前一天，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机会来了，今天可以去看大妹了。”“为什么不搬家后再去呢？”任弼时说：“搬了家就不便去了，因为万一遇到有人盯梢，新的住址被人发现就会发生麻烦。今天去，就是有人发现了，明天也找不到我们了！”

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任弼时更加成熟老练，他没有回头箭，他要朝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结婚以后，陈琮英为他的革命热情所感染，也逐渐投入到他的事业中。1926年，陈琮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留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的陈琮英还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做，自己倒一杯开

水，咕噜咕噜喝下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每当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大冷饼，口袋里揣着几张旧报纸，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琮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在 东 方 大 学 学 习

1926年11月，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琮英随同任弼时，从上海乘“列宁号”油轮启程，来到了莫斯科。

树木凋零，寒风习习。此时陈琮英心中却升腾着幸福的火焰。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异国他乡。这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新鲜、好奇。兄弟国代表的热情好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是在1926年11月12日召开的。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也在22日开幕。当时，欧洲的意大利、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运动，先后遭到资产阶级的镇压。但是，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停止。1925年5月，当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蓬勃开展时，英国50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举世瞩目的两件大事，它们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巩固发展，被称作“世界革命的三大主要支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